

當代韓國政治文化的複合性

• 金容植

一 序言

韓國政治文化具備公論性政治的特徵。當代韓國由於接受了西歐式的政治制度，現代市民社會的公共議論空間佔有優勢。但是，一方面由於不能完全適應純粹的西歐模式等國內各種政治原因，另一方面由於獨特的儒家式公論政治文化的影響，當代韓國的公論性政治具有雙重構造的複合性。朝鮮時代的公論性政治的傳統在向現代變化的過程中，通過衛正斥邪運動顯示出相當大的威力和大眾動員的力量^①。

在前現代時期，韓國從儒家式制度或政治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士紳階層的公論性政治。現代化以來，引進了西歐的制度，但儒家文化和思考模式仍未消失。在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的當代韓國政治中，作為傳統要素的儒家式公論和作為西歐要素的市民社會公論，並非互相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

在前現代時期，韓國從儒家式制度或政治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士紳階層的公論性政治。現代化以來，儒家制度的支配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從西歐引進的制度。但是，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儒家文化和思考模式，即使在進入現代之後仍未消失，甚至還頗有些劫後餘生的迹象^②。特別是在當代韓國政治文化的主要溝通過程中，儒家的思維方式和話語仍然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韓國的政治文化繼承了朝鮮時代的公論性政治文化，知識份子批判政府的言論活動有其獨特的特徵。在威權主義的軍事統治時期，批判性言論及大學或一部分宗教界、在野黨的批判性活動就是公論政治的典型現象，這些批判言論和批判活動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資源，因而得到了高度評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亞地域形成了非儒家化的社會，在正式的制度範圍內，再沒有人去實踐儒家的政治理想了。韓國採用了西歐的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市民教育，因此，作為現代價值觀的自由、平等、民主、正義、發展等觀念成為主流政治話語。但是，在西歐式市民社會的發育期間，依然存在着儒家政治文化的影響。本文試圖探討在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的當代韓國政治中，作為傳統要素的儒家式公論和作為西歐要素的市民社會公論，這兩者的原理之間具有何種關係。對於當代韓國政治來說，這兩種公論的原理並非互相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韓國接受了西歐民主主義和市民社會原理，即使是在快

* 本研究獲得韓國漢城誠信女子大學基金會的資助，特此鳴謝。

速進行現代化的過程中，依然堅持了儒家傳統。本文試圖陳述公論政治和公共領域在韓國政治文化的原型中發揮了何種影響，在接受了西歐市民社會公論性的當代韓國社會裏又是怎樣運作的。

當代東亞和韓國的政治並不存在儒家式公論的制度場域。但是，由於在政治文化的框架中，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意識和民間社會的傳統、以及次文化團體等的活動，在市民社會的公域中經常會再現出儒家式的公論文化。與前現代時期不同，儒家的社會勢力並不具備獨自的公論場域。另外，長期以來，儒教的傳統社會基礎呈弱化現象。儘管如此，在民間社會的私域中，以祭祀和婚姻等家族文化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傳統依然根深柢固^③。有時在士紳階層和小規模的儒家社會團體中會出現輿論擴散的現象，有時由於權勢者有意圖的選擇和宣傳而使儒教的政治文化得到推廣。但是，無論如何，儒家式公論政治的傳統成為了韓國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特徵。現代韓國的公論性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議論，雖然在第一義上根據西歐的制度和原理被開展起來，但同時也重視了儒學的邏輯和思想，特別是在名份論的正統性議論和其他的理念以及圍繞體制的爭論中，出現了西歐文化和東亞儒家文化相輔相成的現象。

在東亞社會裏，一般均承認儒教政治文化的普遍性和廣泛影響。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在具體狀況下，儒家政治文化是怎樣發揮作用，又是怎樣產生影響的。筆者試圖在本文中，分析作為前現代儒教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因素的公論政治和儒教的公論性原理的概念內容，並說明它們究竟是怎樣為當代韓國社會所繼承，又是怎樣產生影響的。為此，首先要考察從前現代就開始存在的儒家式公共領域和公論政治的特性，其次闡述現代市民社會公論性的登場及其特徵。最後將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在韓國當代政治中出現和發展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和公論性的問題，作為圍繞正統性理念而出現的新、舊公論性的複合現象加以探討。

在東亞的舊儒家文明圈各國中，韓國的政治文化具有獨特的傳統，即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公論性政治文化。現代韓國的公論性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議論，雖然是根據西歐的制度和原理開展的，但同時也重視儒學的邏輯和思想，特別是在名份論的正統性議論和其他的理念以及圍繞體制的爭論中，出現了西歐文化和東亞儒家文化相輔相成的現象。

二 朝鮮的儒家式公共領域和儒家式公論政治

在東亞的舊儒家文明圈各國中，韓國的政治文化具有獨特的傳統，即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公論性政治文化。朝鮮時代的儒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的主要部分，表現在士紳的公論性政治上。在朝鮮的公論政治文化中，在前現代的政治過程裏，士族階層的輿論和批判性言論行為起到了牽制政治權力以防止其擴張和腐敗的作用，名份論產生了很強的道學式儒家文化。士紳政治在十五到十七世紀之間朝鮮王朝發展過程中成型，是從王權與臣權之間對立和糾葛的旋渦裏浮現出來的，它可以被視為一種從儒教理想的標準來批判、改革政治社會的公論性政治現象^④。

朝鮮初期的儒家式公論政治傳統，肇始於由地方行政轄區內的士族所設置、名叫「留鄉所」的自發性集會的場域。朝鮮初、中期的「留鄉所」是地方士族根據儒家理念，對地方風俗、行政進行私人批判活動的基礎，後來則成為得到半正式性承認的自治行政公共領域。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成宗和中宗執政期，作為自治性地方行政機關的「留鄉所」，成為地方士大夫階層用以牽制中央派遣的守令的一種勢力基礎，同時也是公論歸納的機關。李樹建的研究指出，

朝鮮的傳統公共領域是從與中國相同的行政機關中產生出來的^⑤。士族根據儒家理念，在具有變革志向、矢志要改變朝鮮社會性格的文士階層裏，形成了地方士紳交換意見、溝通思想的場所^⑥。

朝鮮的公論政治產生於中央儒家式科層組織內部叫做三司的言官制度。由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院構成的三司，是評論施政得失，對糾察鄉風和人事政策等政事進行評論，判斷其是否正確的公共言論機關。但是，朝鮮的公論政治通過以成宗期的趙光祖為首的士紳政治而正式拉開帷幕。到了這個時期，地方士紳社會的公共言論，是通過從事言官職位的新進士林得以反應中央政治的。而所謂的士禍即是新進士紳派以掀起公論的方式挑戰守舊官僚，從而引起反擊的政變^⑦。

十六世紀，以趙光祖為首的士紳勢力以言官職為立腳點，提出性理學的公道論而牽制中央的勳舊功臣^⑧。這時中央言官開始為士紳的言論代言。標榜道學政治的趙光祖試圖促使己卯士紳通過朗官職而就任中央的言論性職位，以便將士紳的公論推行到中央政治中去^⑨。士紳派儒生上疏指出君主的過失，彈劾官僚的非法行為。儒教的公論政治即使到了十七世紀，雖然是以朋黨間共存為前提，並作為相互批判的原理而展開的，但依然僅限於指涉那些在野士紳的輿論。像多達四次的士禍那樣，公論政治雖然受到權力階層的抵抗鎮壓，但是由於道學主義理念的正當性，其動機和意圖的純粹性還是得到了承認。公論政治通過從成宗期到宣祖期的言官職的擴大和強化，而使其基礎得到了鞏固，到十七世紀中葉，在朝鮮的政治過程中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

十八世紀以後，由於朝鮮政治混亂而導致的勢道政治和在地方行政中出現的所謂三政的紊亂，以及英祖、正祖時期封鎖公論的蕩平政策，朝鮮公共領域的功能急劇衰竭。後期的儒家式公論的場域，由行政轄區移至作為士族教育設施的書院。士族進行書院和祠宇等兩班的組織活動，增強士族之間的團結和疏通，以維持地域社會的基礎。他們以書院為中心主導地方鄉論，以促使社會的統治體制安定化。特別是實施鄉約從而鞏固鄉村社會的保守性治理權^⑩。十八世紀出現的濫設書院現象，說明了士族的公論場所由於自我分裂而弱化。特別是畿湖士紳和嶺南士紳由於朋黨政治的分裂而分離開來，作為執權勢力的對抗勢力而鞏固下來，由此嶺南士紳的公論政治被視為對中央權力的挑戰。另外，他們中的一部分成為地方勢力的支援基礎，對於中央政治以儒疏的形式進行集體性活動和表達意願^⑪。但是，十八世紀以後，以三司為中心的中央公論政治失去機能，儒家式的公共領域走向衰退^⑫。十九世紀中葉，隨着大院君的改革政策的推進，下達了廢除全國書院的命令，但事實上在私域中的書院並未能被廢止。十九世紀末，傳統公共領域的書院成為儒林進行衛正斥邪民族運動的立腳點。

朝鮮初期的儒家式公論政治傳統，肇始於由地方行政轄區內的士族所設置的、「留鄉所」自發性集會的場域。朝鮮初、中期的「留鄉所」是地方士族根據儒家理念，對地方風俗、行政進行私人批判活動的基礎，後來則成為得到半正式性承認的自治行政公共領域。

三 近代韓國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形成和挫折

1876年對外開放口岸以後，朝鮮社會實現了商業化，引進現代貨幣制和銀行系統，培育民族資本，並鋪設了現代交通和通信的線路網路，急劇變革的成就有目共睹。從1880年代中期開始，開化派和朝鮮的統治階層開始通過設立現

代學校和教育機關、發行現代報紙、容許創辦基督教學校及設立教會等方式，將現代西歐的制度和價值觀注入韓國社會。

到了1890年後半期，現代西歐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首次在朝鮮成型。從美國歸國的開化派領袖徐在弼，創辦了最早的現代朝鮮語報紙《獨立新聞》及其姐妹團體獨立協會，展開民眾啟蒙運動和改革運動。作為高級官僚社交圈(circle)出現的獨立協會逐漸開放門戶，成為新知識階層的自發結社。可以說，《獨立新聞》與《皇城新聞》、《每日新聞》、《帝國新聞》等開化派系列的報刊一起，為韓國社會現代化輿論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和《大韓每日申報》成為新知識階層的改革主義和啟蒙主義的主要媒體，開始在舊韓國社會裏形成，傳播新的現代公論。《獨立新聞》後來在全國範圍內發行到三千份左右，把商人、學生、新知識份子階層吸收到自己的讀者群裏。

在《獨立新聞》和獨立協會從國家的控制之下獨立出來，發展為現代民間的市民運動的過程中，討論會發揮了重大作用。獨立協會運動使民族的新興知識份子層出不窮，並向他們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即對於建立現代國家來說，政治性公論和公共領域具有關鍵的意義。獨立協會的激進改革主義者，試圖通過創設政治的公共領域以及自己的黨派團體，以搶佔壟斷性地位的方式來使近代化改革成功。但是，由於高宗採取了鎮壓措施，1899年1月獨立協會被解散，以後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急劇弱化。日俄戰爭以後，大韓自強會通過愛國啟蒙運動試圖恢復現代公共領域。但是，該組織未能在發展政治公論的同時，形成能夠維護國家權力的政治向心力，從而也未能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十九世紀末期的現代韓國，形成了一種不安定的相異群體共存的狀態。傳統公共領域的影響力隨着朝鮮王朝崩潰而急劇弱化。但是，以地方士紳為中心的儒家式公論的場域卻一直存續到韓末時期，在衛正斥邪運動和義兵運動中發揮了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在東學運動這一時期，民眾的公共領域借助執綱所的運動而氣勢大增，但最終受到政治權力的鎮壓而消聲隱迹。與此相反，現代公共領域在現代結社和社會溝通活動(communication)的發展中找到了生長點，但是，在十九世紀末期獨立協會解散以後，隨着《獨立新聞》的弱化，其政治機能也隨之消失。

1890年後半期，現代西歐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首次在朝鮮成型。開化派領袖徐在弼，創辦了最早的現代朝鮮語報紙《獨立新聞》及其姐妹團體獨立協會，展開民眾啟蒙運動和改革運動。獨立協會運動向新興知識份子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即對於建立現代國家來說，政治性公論和公共領域具有關鍵的意義。

四 當代韓國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和公論性

(1) 當代的議會政治制度和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

當代韓國因導入西歐式代議民主制而使傳統的公共領域失去其制度基礎。另一方面，現代公共領域因現代性的言論、出版及社會團體的增加而開始成長，但在國家權力面前直不起腰來的民間社會只能在名義上確立私人領域。然而，從朝鮮王朝以來，在擁有強有力的公論政治傳統的韓國政治中，即使到了當代，仍然可以看到對政治權力進行頗為可觀的牽制和批判的公論政治形態。當代政治制度因按照西歐方式分為國家部門的議會政治和市民社會的政治領域而分別運作，在與前現代不同的雙重性公論構造的基礎上開展公論政治活動

(politics of public opinion) ⑬。在設立國會這種代議制下的正式的公共領域之後，當代韓國在制度層面形成了公論政治的凝聚力。但是，第一任總統李承晚不相信國會的代議政治的機能，以朝鮮戰爭的危機為藉口進行了修憲活動，將總統間接選舉制改為直接選舉制。韓國從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之後，其議會政治多次出現的不平衡性和統治權力的威權主義化傾向，因為只容忍有限的多元主義而未能導致議會主義的發展⑭。

在公論政治中，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不使用暴力，而是以選舉以及輿論支持率來決定勝負，這正是代議制度的基本前提。但是，韓國的政治文化未能導致對總統和行政府的統治行為進行建設性批判和審議的活動的安定化，議會對公論因勢利導的技能，也因政治派閥之間圍繞特殊利益而展開的矛盾和鬥爭而黯然失色。在人們眼裏，議會並不是進行民主決策的論壇，而只是不得妥協文化箇中三昧的政治人之間爭權奪利的決鬥場⑮。

因此，當代韓國的公論政治是由作為市民社會內公共領域的大學、宗教界、言論界的知識份子的批判式公論活動而推動的。於是，在當代韓國以反映民意為宗旨的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具有隨着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自律性的增強而愈加活躍的屬性⑯。

行政府和執政黨想通過由上而下式的廣報、宣傳活動而壟斷輿論的支援，但是這一企圖因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實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失敗，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是言論界和在野黨自下而上地展開了批判性公論。儒家式公論政治雖然具有道學傳統，但還是受到批判性公論的影響，而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具有不妥協的改革志向。有時連市民社會的公論提倡者本身的行為動機也可以受到懷疑。也就是說，他們的主張必須具備公益和公德的普遍性，但是這要求具備高度的名份和正當性。另外，執政黨也廣泛開展積極的宣傳和廣報活動，當出現危機時，則通過國民投票進行輿論政治，因此在野黨和市民團體要不斷主張公論性也不是一件易事。

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在李承晚統治時期顯現出制度上的雛形，批判性言論和在野黨的公論活動也持續不斷。但是，以50年代末的《京鄉新聞》停刊措施為標誌，隨着政治權力加強其威權主義的控制力，批判性言論受到規制，公論場所趨於萎縮。這種政治權力的壓制措施在60年代初「5·16」事件之後重新登場，正如在1970年代初的「十月維新」宣布之後的《東亞日報》廣告事件所表明那樣，壓制措施的反覆實行，使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變得氣息奄奄了⑰。

每當代議制民主主義和西歐的合理主義弱化時，威權主義政權都要求助於儒家的政治文化，最典型的實例是朴正熙總統在政治維新時代提倡忠孝思想以及韓國式民主主義論。朴總統執政的後半期重新引進儒家政治文化，採取了通過忠孝思想和政治倫理的教育來創造臣民型政治文化的方式。為此，反對維新體制的抵抗勢力在理念上強調民主和人權這些西歐價值，但在形態上則模仿了朝鮮王朝的公論政治。正如朝鮮王朝的公論政治主導儒家社會知識份子階層的輿論那樣，市民社會的大學、宗教界以及言論界的知識份子儘管受到鎮壓，但還是舉起了堅決抵制的大旗。韓日會談期間，反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在野力量，再次強烈反抗三選修憲以後的朴總統。一方面宣布樹立維新體制，另一方面以保安及經濟成長為藉口，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來侵犯言論自由和基本人

儒家式公論政治雖然具有道學傳統，但還是受到批判性公論的影響，而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具有不妥協的改革志向。有時連市民社會的公論提倡者本身的行為動機也可以受到懷疑。也就是說，他們的主張必須具備公益和公德的普遍性，但是這要求具備高度的名份和正當性。

權，這些正是以威權主義式產業化為目的的開發獨裁體制的必然性要素，但是，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因此而備受摧殘。

(2) 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和儒家式的公論性

市民社會的公論性通過市民社會公共領域中各種團體和個人活動，以及他們的大眾媒體活動而保持活力。在十九世紀以前，儒家式的公論性佔有絕對優勢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以後，當代韓國社會的公論性則是由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執輿論之牛耳。市民社會的公論性的基本原理，一般包括強調個人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自由民主主義、從殖民地時代起一直受到重視的民族主義傳統，以及保障人權和隱私等西歐現代性的基本原理。但是，在當代韓國，除此以外有時也強調儒家式政治社會的價值理念。即在韓國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往往也包含一部分儒家式公論性原理。在正式的話語中，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是與儒家式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類型，與西歐式的批判活動如出一轍。但是，即使在西歐制度的框架中，也還是經常可以發現潛藏於群眾社會底層的儒家式社會心理，以及在政界和知識份子階層中一脈相承的儒家式話語行為的傳統。

從民眾生活方面來看，在私域中仍殘存着傳統領域，主要是繼承儒家式冠婚喪祭禮儀的祭祀共同體的傳統。該傳統本身是構成私域的原理，無從形成公共性的輿論。但是，儒家式言論由於支援、傳播傳統的價值和思考方式，即使在發達的產業社會中也依然存在並發揮着作用。在現代政治中，作為社會勢力的儒士階層雖然極度弱化，但是，在一般的輿論和言論上，儒家式政治文化依然相當廣泛地周流於社會底層。

在現代社會，儒家式公論性的社會基礎可以說是存在於由家族和親戚組成的網絡中。東亞社會按照儒家式慣習，通過家庭教育以及維持婚姻、祭祀等社會制度來確保傳統儒家文化再生產的結構。另外，自發性結社團體也大都具有因血緣或地緣關係而結合起來的共同體的特性，這些都與儒家的、保守的倫理意識有着緊密聯繫。但是，在有亡國之恨的韓國當代政治中，傳統政治文化的因素與現代性因素相比，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受現代西歐的影響而急劇變化的韓國社會，一般對統治階層的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但儒家式公論性是個例外，它因為具有與西歐公論性同樣的改革指向和批判權力的特徵，而被積極地繼承下來。

韓國市民社會的公論性往往包含一部分儒家式公論性原理。即使在西歐制度的框架中，也還是經常可以發現潛藏於群眾社會底層的儒家式社會心理，以及在政界和知識份子階層中一脈相承的儒家式話語行為的傳統。在一般的輿論和言論上，儒家式政治文化依然廣泛地周流於社會底層。

五 當代韓國的公論政治與合法性爭論

(1) 公論政治與合法性爭論

在當代韓國政治中，就政權的合法性和政策而展開的爭論，一直是市民社會公論性的主要議題。朝鮮儒家式公論政治文化具有很濃厚的名份論色彩，具有以儒家的為民執政和德治的理想為標準來裁決和批判現實政治的傾向。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以後，在幾乎所有質疑權力合法性問題中，一方面有出於政治權

在當代韓國政治中，就政權的合法性和政策而展開的爭論一直是市民社會公論性的主要議題。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以後，在幾乎所有質疑權力合法性問題中，一方面是出於政治權力本身的缺陷和弱點，但也有沿襲過份執着於名份論的儒家式公論政治形態的一面。

力本身的缺陷和弱點，但也有沿襲過份執着於名份論的儒家式公論政治形態的一面。對於這種不妥協的儒家式公論政治的慣例，執政者採取了不是說服而是壓服的對應措施，從而導致政局進一步緊張。

在1964年韓日會談之際，朴正熙政府遭遇了空前的執政危機。儘管大多數公民都承認韓日兩國之間有必要建立外交關係，國會也通過了相關議案，但大學和知識界則猛烈反對。從1963年3月到6月初，韓國的大學舉行了大規模反日示威活動。學生們從5月開始提起以民族主義為主題的公論，漢城大學文理學院的學生舉行「民族的民族主義葬禮儀式」，譴責軍人政權的反民族性。5月末，漢城大學教授發表了收拾時局的決議文，間接支援學生的反政府運動。6月3日，市民也加入了全國性的學生示威活動，約有十多萬人示威遊行。政府則宣布戒嚴令，實施言論檢閱制，竭力防止民間反對輿論擴散¹⁸。

60年代中期以大學為中心的反日民族主義的公論政治，因政府的戒嚴令而被阻止，以後政府實施了有效的社會統制。在60年代對大學和知識階層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思想界》，一方面開展了反對韓日會談和反對軍事革命的群眾運動，另一方面提倡民主主義，開展了批判式公論活動。張俊河、咸錫憲等名人兼批判性知識份子主導的《思想界》，不斷向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戰。該刊從60年代後半期起遭到鎮壓，在1970年被迫停刊。這是針對《思想界》登載的金芝河的詩《五賊》被在野黨機關刊物《民主前線》轉載的事態所採取的措施，是對市民社會的公論性的一記重錘反擊¹⁹。

第三共和國在1963年和1967年的選舉中當選，相對而言在合法性上沒有甚麼重大問題，但由於1969年朴總統為了實現三選而修憲，再次引起了市民公論性的堅決抵抗。針對執政黨的三選修憲案，在野黨宣布進行反對修憲的全民鬥爭，並投入了議會之外的鬥爭。對於市民社會的公論抵抗，朴政府進行了公民投票，儘管在漢城市有53%的投票者表示反對，但修憲方案成功獲得了全國投票者65.1%的多數支援。

對於1972年宣布的維新體制，在野的知識份子、宗教人士、舊政治家的同盟勢力結成了「恢復民主國民會議」，以示對抗。但是，在言論和基本權利受到極度限制的情況下，市民社會的公論性被削弱了。政府又於1975年初通過公民投票，顯示統治體制的正當性，接着發布了九號緊急措施，以阻止大學和在野人士的影響力²⁰。但是，在70年代維新體制下，對反對派輿論的極度鎮壓使政界萎靡不振，引起了在野黨和知識份子階層的抵抗，結果導致了政治動盪。當然，只有在批判性輿論承載高水準的合理性和道德性時，才能實現公論政治，如果因黨利黨略，只是一味為反對而反對，並且提不出替代性方案的批判性活動的話，就連那批判的合法性也將會受到懷疑。

維新初期，反對運動未達到有組織的大眾運動程度，以大學和教會為據點的市民社會領導集團標榜西歐的自由民主主義和人權，並據此發起抵抗性公論。這種類型在1987年圍繞第五共和國的直選制修憲而反覆呈現，在70年代中成長起來的中產階層，支援由在野黨和一部分宗教界人士進行的民主化運動，通過從5月末起進行的全民性的「6·10」民眾抗爭，對市民社會公論實行了總動員。直選制的修憲案得以通過，韓國政治迎來了真正的民主化時期。此後各種各樣的市民運動和言論活動都蓬勃發展，市民社會的公論性進入全盛期²¹。

最近，在金大中政府的治下，借改革言路之名行控制言路之實，可想而知在2002年總統選舉之前，針對執政黨的批判性言論勢必要白熾化。這是因為韓國政治擁有公論政治的傳統，即重視對於政府統治政策和支配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性公論活動的強大言論媒體的傳統。

(2) 市民社會的公論政治和儒家式公論性

在當代韓國政治中，除了士紳和成均館等特殊的社會利益團體，並不存在任何在政界壟斷儒家式話語的團體和勢力。可以說，傳播當代韓國儒家政治文化的媒體是教育和私域的生活文化。因此，當代韓國的七大政治文化指標——威權主義、擬人主義、派閥主義、共同體意識、形式主義—名份主義、抵抗性、民族主義——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與傳統儒家政治文化有直接聯繫的^②。

當代韓國並不存在儒家式公論的獨立場所。但是，在佔優勢的公共領域內，經常可以發現儒家式公論性以次文化的形態表現出來。儒家式的公論性與市民社會相比，其弱點是不具備政治網絡。經過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的產業化，地方農業社會的傳統部門迅速解體了。即使到了60-70年代，仍可發現地方上有奉命投票等傳統臣民文化的痕迹，但隨着80年代以後城市化的進展，傳統部門的規模顯著被縮小了。

當代韓國的官方理念是自由民主主義，但實質內容因反共產主義以及威權主義而在相當程度上變質了。公論政治的傳統是在市民社會的政治文化中加入儒家名份論的傳統，通過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理念主導對政治權力的批判^③。

儒家式的公論性基於東亞社會的家族文化，通過日常的儒家倫理意識得以傳授。特別是在政治上、社會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公共性事件發生之際，儒家式的政治話語應運而再生，並對政治言論產生影響。暫且不論進行名份論批判的儒家式公論政治的慣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當代韓國狀況的問題，無論如何，它還是發揮了批判權力的作用。因此，對於從事公論性政治活動的人，要求其必須具備通過精煉的現實分析，能夠對政治社會的實際狀況進行批判的能力。在一般場合，孰為傳統，孰為現代，這種區別是很曖昧的。特別是在擺脫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以後，圍繞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而展開的爭論大都沒有得出結論，政治議論出現了兩極分化^④。1958年《京鄉新聞》的社論與一般報紙的論調相同，始終對政府持反對、非難以及否定的態度。根據有關調查的資料，《京鄉新聞》社論的62%都表達了反對政府政策的立場^⑤。

在野黨和民間言論對執政黨的政治領導人多次提出引咎免職之論，這彷彿是朝鮮時代典型的上疏文化的再現。當然，在西歐民主政治中也有責任政治，但韓國由在野黨和言論界提出要求撤換高級領導人的次數之多，是其他國家不可相提並論的。在韓國政治中對公職人員的人事問題和政治人物的倫理問題提起批判公論的慣例，實際上正是承襲了儒家式公論政治的餘緒。

在韓國的公論政治中，經過60年代的軍事革命時期和70年代的維新時期，合法性爭論被集中地提出來了。就創造出韓國式產業化模型的朴正熙統治體制的正當性，最近學界一方面對其有所肯定，但另一方面，對其侵害人權、歪曲民主主義等行徑也有否定性的評價^⑥。

在當代韓國佔優勢的公共領域內，經常可以發現儒家式公論性以次文化形態表現出來。政府的官方理念是自由民主主義，但其實質內容因反共產主義以及威權主義而變質了。公論政治傳統是在市民社會的政治文化中加入儒家名份論的傳統，通過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理念來主導對政治權力的批判。

六 結語：當代韓國政治與儒家式的公論性

當代韓國和東亞的市民社會的公論性，隨着產業市民社會的發達而日益強化。但是，由於作為儒家式公論的載體的獨特政治制度在當代非常脆弱，所以儒家式公論性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與市民社會公論性結合在一起，並以補充市民社會公論性的形式出現。如果說市民社會的公論性是佔優勢的類型，那麼儒家式公論性則帶有次文化的派生性特徵。

因為在東亞不具備像西歐那樣強有力的市民社會政治文化的傳統，所以國家的介入活動和宣傳等，對於市民社會公論性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因為傳統的、儒家式的社會價值體系一般以等級論為中心，所以與自由主義者相比，威權主義國家對於傳統儒家話語的復興抱有很強烈的關心。可以說，維新時期的忠孝思想和國民倫理教育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實例。

但是，儒家式的話語也未必就是統治者和國家的專利。因為在抵抗的象徵符號和邏輯中也可以出現儒家式話語。像衛正斥邪的反外勢邏輯就可以在進步主義的言論和農民運動等社會運動中看到，在抵抗主義的文學和思想中也可以發現傳統的儒家思想。因此，未必可以說抵抗是西歐式的，服從是儒家式的。儒家的公論性是在同意型政治文化的框架中，把批判活動作為國政主要方針的傳統時代的合理性政治文化。

威權主義國家對於傳統儒家話語的復興抱有很強烈的關心，但儒家式話語也未必就是統治者和國家的專利。因為在抵抗的象徵符號和邏輯中也可以出現儒家式話語。在抵抗主義的文學和思想中也可以發現傳統的儒家思想。因此，未必可以說抵抗是西歐式的，服從是儒家式的。

雖然一般都按照西歐模式（即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鬥爭）來講述韓國的民主化，但筆者認為，這樣做卻使民主化和民主主義的問題與同意和說服割裂開來，被矮化成簡單的權力鬥爭問題。儒家式批判的公論性也因無代替方案而具有只是盲目進行批判的危險性。韓國是世界上要求更迭和調動高級官僚、長官、總理最多的國家，這是韓國政府效率不高和無能的主要原因。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治矛盾和議論文化的傳統不具備達成政治合意、提示代替性方案的能力，而流於煽動過激的相互鬥爭，這也是儒家式公論性的一個消極側面^②。在這樣的過程中，儒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作為政治動員和批判的手段而被利用。問題在於這種利用的結果，很可能會歪曲近代市民社會的政治，導致西歐式民主制度的變質。

對於鞏固民主主義而言，正確地繼承傳統的要素與建構西歐式市民社會的作業同樣重要。在清楚地認識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以及共同點的基礎上，要防止因錯誤地混用這些因素而導致不協調的問題發生。即有必要適當利用東亞社會的合意政治的傳統，揚棄對抗性政治文化。不是靠訴諸群眾情緒和保守的價值、濫用儒家式的象徵符號，而是應當正確地繼承儒家精神，並使之在民主的政治過程中發揮作用。在正確探討儒家的公論性與現代產業社會以及市民社會公論性框架之間的結合點的基礎上，可以實現東亞社會更加豐富多樣的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協調。

註釋

- ① 金容植：《韓國近現代政治論》(Nanam, 1999)。
- ②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③ 崔吉城編：《韓國的社會和宗教》(亞細亞文化史，1982)；Martina Deuchler,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n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 ④⑦ 金容植：〈韓國政治和公論性：儒教的公論政治和公共領域〉，《國際政治論叢》，第三十八卷第三期(1998)。
- ⑤⑩ 李樹建：《朝鮮時代地方行政史》(民音社，1989)。
- ⑥⑯ 李泰鎮：《朝鮮儒教社會史論》(知識產業社，1986)。
- ⑧ 鄭萬祚：〈朝鮮時代的士林政治——十七世紀的政治形態〉，載李種旭等：《韓國史上的政治形態》(一潮閣，1993)，頁213。
- ⑨ 崔異敦：《朝鮮中期士林政治構造研究》(一潮閣，1994)，頁141。
- ⑫ 同註⑧。
- ⑬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307.
- ⑭ 韓培浩：《韓國政治變動論》(法文社，1994)；鄭範謨：〈自由民主主義的韓國模型摸索〉，《自由民主主義的韓國模型研究》(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0)；金學俊：《韓國政治論辭典》(Hangil社，1990)。
- ⑮ 金容植：〈二十一世紀韓國政治框架轉換〉，《大韓政治學會報》，第八卷第二期(2000)；Rune Slagstad,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Its Critics: Carl Schmitt and Max Weber",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ed. Jone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⑯ 李信行：〈韓國政治的領域現象〉，載韓國政治學會編：《韓國現代政治史》(法文社，1995)；韓國政治學會、韓國社會學會合編：《韓國的國家和市民社會》(Hanwool, 1992)。
- ⑰ 姜俊萬：《權力變換：韓國言論117年史》(人物和思想社，2000)；李在五：《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形成社，1984)。
- ⑱ 同註⑰李在五，頁224-33；Kim Kwan Bong, *The Korea-Japan Treaty Crisis an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Korean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71)。
- ⑲ 李容成：〈關於《思想界》知識份子和雜誌理念的研究〉，《出版雜誌研究》，第五卷第一期(1997)；金正源：《分斷韓國史》(Yejin, 1992)，頁324。
- ⑳ 金永明：《韓國現代政治史》(乙酉文化史，1992)。
- ㉑ 同註⑱李信行。
- ㉒ 韓培浩、魚秀永：〈關於韓國政治文化的變化和持續性的研究〉，《韓國政治學會報》，第三十卷第三期(1996)；魚秀永：《民主主義和韓國政治》(法文社，1994)。
- ㉓ 全宰鎬：〈以自由民主主義為中心所看到的民主化運動〉，《韓國政治外交史論叢》，第二十二卷第二期(2000)。
- ㉔ 同註⑱金容植；陳德奎：《韓國現代政治史序說》(知識產業社，2000)。
- ㉕ 韓培浩：〈關於京鄉報廢刊決定的研究〉，載陳德奎等：《1950年代的認識》(Hangil社，1981)。
- ㉖ 《傳統和現代》(1997秋號)；李康老：〈第三共和國政治制度的正統性和朴正熙政府〉，《韓國政治學會報》，第三十卷第四期(1997)；李鍾恩：〈維新體制的開始和體制論爭〉，載《現代韓國體制論爭史研究》(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2)。
- ㉗ Pak Chi-Young,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Korea*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